

●●●●● 陆复初·著

●●● 云南人民出版社

王船山 山沈思录

母氏六震壽徽

庚戌新秋雨唐子

人壽滄海之人二

唐世之考得於相黨之著者

公因面而為之說

無儀之義替稱所



B249.2

01

● 陆复初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王船山沉思录

封面题字：李鉴钊

封面设计：王玉辉

责任编辑：乃 东

王船山沉思录

陆复初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地震局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8 字数：18,6732

1991 年 1月第1版 1991 年 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册

ISBN 7-222-00509-9/B·49 定价：3.3元

残雪压枝犹有桔

——序复初兄《王船山沉思录》

王 起

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

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

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

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

——欧阳修《戏答元珍》

复初兄《王船山学案》出版于1987年。1988年底，来函说他近来所写《王船山沉思录》，将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嘱为序，复初兄辛勤笔耕，大著接连问世，自当祝贺，至于为序，则唯有自惭。回想我们所走过的生活道路，沉思中，不免想到上面抄录的欧诗，觉得其情其景，颇有合乎今日之处。有人说，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有很大一部分是由知识分子苦难史组成的，此论如何，尚有待更充分的论证，但“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则成了几千年讲志气、有学问的人，免不了要经历的道路，确是事实。这位欧阳修还曾有过一句名言：“正直，有学问，君子人也”，并解释道：“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学问者必能辨是非”。我以为这两者都离不开审思，通过正反比较、分辨，找出答案，以“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夫犹未悔”的精神坚定地走下去。自然，这还有个胆识的问题。总之，没有这种精神的人，自己偏要随波逐流，甘心俯仰于人，那就不好说了。同样，对于本

文上面提到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问题，如果是，不先解决立身处世的根本问题，憎爱分明，便分不清历史的功过，人世间的大的大非也难分清了。以王船山先生论，国亡家破，一生坎坷，但在道德学问上，船山先生是中国的“筋骨和脊梁”，炎黄子孙都会引他为骄傲的。而与船山先生同时代，并同他一样受到后人尊敬的，还有顾亭林、黄黎洲、傅青主等。但是，社会并不只由这类人组成，与这些“筋骨和脊梁”相反，还有那些生活优裕或一心追求仕途通达的人，他们在世时声名显赫，享尽人间、人世的富贵，没世没几天骂名就来了，人也被钉在耻辱柱上。象钱谦益，论年纪，钱大王船山四十几岁，论名气，钱早年首入东林，为当时文坛的领袖人物，江左的才子，但三百年来，没有人研究钱的诗文，加以称道，提到他，大都拿他殉节怕水冷，投清后为天下所不齿来说笑话。可见，知识分子演出的是喜剧或是悲剧，演出者自己不是全然无主的。我们既生而为人，既享受着前人和当代人的创造发明，能不为我们当代、我们的后人，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吗？我们不是苟且偷生，也不是都要成为什么大慈大悲的圣者，我们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们所以冒险犯难，又所以忍辱负重，就因为我们是人，是一个至少要做自己的主人的人。然而，我们不能脱离社会，不能脱离我们的祖国，我们的民族，不能脱离哺育我们的母亲——大地和山河。

一个人从开始懂事时起，总有他自己引为自豪的事。那么，你、我、他，我们这些作为一名炎黄子孙的人，首先应该怎么回答呢？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以我们的中华祖国而无比自豪。用这样的话去和那些失去民族自信心的文化虚无主义者交谈，是谈不拢的。然而，我确信，看一个民族，看一个国家是否真正有力量，不仅在它处于顺境时，而更在它处于逆境时。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祖国，近百年有过危亡旦夕的时刻，

但我们的民族没有屈服，没有自甘落后，“岁寒而后知松柏之后凋”，这是我们民族古老的名言。我们的国家曾象患了重病的人，但它没有向任何死神低过头，它挣扎，反抗，它终于又傲然地站起来了。

去年以来，在我们社会上兴起了批判传统、传统观念之风。批判、否定前人一些陈旧的、对于人类的发展非但没有进步作用反而起阻碍作用的东西是不可免的，也是应当的。好象走路一样，后面的脚步总要落在前人的脚印上，以后路才会更平整，更有利于再后的人，但绝不能为了一时的痛快，而要实事求是，区别一下它的昨天和今天——也就是被批判者的当时与现在。“五四”所以振铎古今，正是在那个时代，批判旧传统是为了给科学和民主开辟道路，标志着中国人民的新觉醒。但它是以民族自信心为前提的，它的目的就在于改造社会和振兴中华。一九三四年，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去了自信心》一文中说：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然是专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盖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都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看地底下。”

“五四”运动的佼佼者，何尝象今天某些反传统主义者那样丧失了民族的自信心呢？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我们民族的“自信力”、中国的“筋骨和脊梁”以及“看看地底下”的羣

完美的回答。

中国有专制主义的传统，也有反专制争民主的传统，后者被摧残、被抹杀于一时而终于爆发了为革命开辟道路的“五四”运动。如今，距“五四”时过七十年，那些腐朽的、没落的东西，为什么在这七十年中又有了繁衍，人们又为“抹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不去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呢？仅仅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呢？还有其他更主要的原因？正象一个医生，要研究研究在他的“消毒”过后的无菌室里，偏偏接二连三病倒人？“五四”对“科学与民主”的憧憬远没有彻底的解决，究竟为了什么？这就要把自己和七十年来风云中种种仔细研究研究。这是有点复杂，它不光要批判，而更要理解，要知今知古，知中知西，为传统和现代化，东方和西方架起一座虹的桥梁，这前提仍是要恢复民族的自信心，珍惜民族的“筋骨和脊梁”。丧失了民族自信心，丢掉了筋骨和脊梁，就更谈不上争取科学与民主的最终实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在面临挑战的生存与毁灭之间，必须自主地选择前进的道路。

我和复初兄本是北京一所新闻学院的同学，他是学长、师兄。在那“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岁月里，我们基于共同的认识：不当，也不要我们的同胞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困奴。我们要自主，要做一点我们自认为有益于社会的事，便各奔前程。他万里迢迢到了大后方，我仍在沦陷区，直到抗日战争胜利，我们又在北京会合了。因为我们反对蒋介石打内战，又因为我们都认为祖国在百年积弱之后要急起直追变成一个民主富强的新中国，我们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地下斗争，后来，又同是当时新闻界支部委员会的成员。北平解放后，我们年轻火热的心，在时代的大熔炉里同样发着炽烈的光和热，于是当年，我们又自北京而南京，万里步行分别来到即将解放还

没有解放的云南。从此，我们便在祖国这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经历着我们过去想都没想过的种种风雨。如今，我们都老了，都到了病痛满身的衰朽之年，但我们怎能丢掉我们应当为社会尽自己一份力量的初衷？故此书的问世，其旨深矣！

虽然我们那最好的壮年岁月在辱骂声和镣铐声中消逝了，虽然欧诗中的残雪压枝和我们经受的残雪有所不同，但残雪毕竟是残雪，让它顺着树枝象泪水一样消融到大地中去吧！

1989年2月于昆明

我与船山学

——自序

洪炉滴水试烹煎，穷措生涯有火传。

哀雁频分弦上怨，冻蜂长惜纸中天。

知恩不浅难忘此，别调相弹更惘然。

旧识五湖霜月好，寒梅春在野塘边。

——王船山《极丸老人书所示刘安礼诗垂寄，情见乎词，愚一往呐吃，无以奉答，聊次其韵述怀。》

——《薑斋六十自定稿》

读这首诗，领悟到它的份量，它实在是凝聚了“迄今所有的全部生活经历”（黑格尔语），才锤炼出来的。

长吟此诗，不禁浮想联翩，也追忆起自己的全部生活经历。我的生活经历是怎么走过来的，可以归结为跌宕起伏四个字，而在纷纭陆离之中走出一条路子，没有别的，就靠“走着瞧”这三个字，我越来越明白，这不是偶因论，而是实践的唯物主义。所以，我的座右铭就是“走着瞧”。

“走着瞧”这个观念，支持着青年时代的我经受了洪炉的烹煎，又支持着我渡过寂寞的华年，而于老之将至的穷措生涯之中，俯仰古今，得其火传之趣。

可是这三个字的铭言，我是近来才认识到它的价值的。因为早在四十多年前，我提出了这三个字，就被作为大自由主义者而受到批判了，因此引以为戒，不敢再提，也不敢再犯，一直到了垂暮之年，才觉得这三个字并没有错，近来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随感录，有人提出：“实践社会主义要求的就是‘走着瞧’，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这虽是极为简单的常识，但在精

神的重负之下，做起来却并不容易”，我的“走着瞧”的初级思维四十多年之后，才得到了共鸣。

有人对解放以来的三代文化人，作了一个分析，把十七年的一代，称为“驯服的一代”，“文革”中成长的一代，称为“怀疑的一代”，而现在的大学生呢？尚难给予确切的命名。那么，像我这样横跨新旧两个社会的文化人如何呢？说旧吧，并不完全旧，因为直接接受过辛亥志士和“五四”健将的传统。说新吧，并不完全新，因为又接受过“驯服的一代”的严格教育，并且经历了长期批判和折腾。只不过没有走上“空怀壮志，泪落黄泉”那一步，而是经受住了艰难的考验走过来了。什么力量支持着我走过来的，正是被批判了的这个“走着瞧”的三个字，以不在场的、潜意识的潜在力量，支持着我渡过艰辛岁月的。

我确实是从一个自由主义者，通过反复的实践，在人生的道路上接触过各种类型的人物，涉猎过古今中外各种流派的书籍，而终于以“走着瞧”的态度，使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因而创造了我历史上的一段黄金时代。可是，解放以来，不论在意识上或者实践上都产生了有形或无形的约束，似乎撇开了“走着瞧”的念头，把个人作为从属于他人、他物而存在，靠别人的恩典为生，而不是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于是一言一行，必须做到凡是领导说过的，上级指示的，文件规定的，才是处世做人的根本准则，不敢逾越一步，“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的四箴，反而成了我的座右铭，达到了“前有谗而不知，后有贼而不知”的愚昧程度。但这也难于避免无情的打击，横飞的帽子。遇此情况我曾不知所措，实践要以什么为准绳？思想要以什么为范式？我采取了“呼我以牛则牛应之，呼我以马则马应之”的存在方式。这时在我的灵魂

中，不在场的、潜意识的“走着瞧”与“臣罪当诛今天王圣明”的在场的，显意识之间发生了强烈的碰撞，在碰撞之中，斐然有著述之意，但受僵化模式的约束，才思枯竭，长期写不出来。近十年来，随着大的环境的转变，使我明白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可以有两种接受方式，一种是把它作为教条，作为僵化的模式。另一种则是把它作为理论和实践的指针，把它化作一座桥梁，沟通起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的思想精华合一炉而冶之，以创造性的思维，迎接挑战，找到走出迷宫之路。于是我解除了心灵上的禁锢，经过长期的反思，理解到“知思不浅”并不妨碍“别调相看”，我的信仰，百死不悔，而我的认知，独抒胸臆，二者是没有什么扞格不通的，于是罄其所学，而有《王船山学案》之著，这是一个契机，此中甘苦，余自知之，余自得之，难言之也。但这部著作是用传统的学案形式，虽有新解，不脱我注船山，而尚未能以“撒手悬崖，解揽放舟”的精神以船山注我的心态，对他的思想框架作出全方位的描述，因而又有《王船山沉思录》之构思。我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桥梁，把王船山的启蒙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二十世纪新的思潮相结合、相补充，使吾船山学能够在西方现代思维的诸学派中巍然屹立，以确凿事实证明中国传统思维颠峰状态的船山学，无愧为中华民族的瑰宝，历百劫而更能放出耀眼的光芒。

近阅台北刘大悲译日本人铃木大拙所著《禅与生活》序，刘氏称：“存在主义可以说是西方文化的一座桥梁”，余不谓然。存在主义在中国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中国要寻找传统与近代化的结合点，只能够以马克思主义为桥梁，我正是在千万次实践考验之余以马克思生义为基点，而有《王船山沉思录》之作。余多年反思之所得，搭建阅读船山遗书，提出船山三论——物论、心论、史论作为他的理论框架，三者形成一个整体结构。我说船山的物论，不光有着“太虚一实”的一

个方面，还有着“无中之妙”的另一个方面，这样就跨越了机械论的世界图景，而趋向于相对论的世界图景，船山物论的造诣，是确认了物质世界不是单线的，而是多维的，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是由偶然而必然的，是相干而又协同的。我说船山的心论，以往学者，不敢涉足，把船山这个精彩部分当作糟粕给扔掉了。船山心论是他沟通潜意识与显意识，理性与非理性，生命与精神，爱欲与文明，人的命运与人的解放的追寻和探索，他着力在于生死之际，爱憎之顷，不搬教条，不赶浪头，“壁立万仞，只争一线”，这是不可言说的，惟有自喻于心的。缺此一个环节，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就丧失殆尽了。船山的心论，岂可等闲视之呢？我说船山的史论，是联系过去，立足今天，面向未来的“三际”以“一念”为枢纽联系起来。所谓“一念”就是不要脱离实际去看历史，历史将为我们所用，所以历史不是包袱，而“述往”正是“以为来者之师”的。因此观察和思考历史，不仅要看出场的方面去看，而更重要的要从不出场的方面去看，不出场的必然走向出场，而出场的难免要倒台，掌握出场与不出场的铰合链，关键在于“俟之”，“待之”，就是西方后结构主义者所说的“缓别”。历史发展必然的趋势，不管有多少曲折，总的一定是进步战胜落后，公理战胜强权。但人处在历史不断迂回曲折之中，在个人机遇上，不幸总是多于有幸的，这就要有所准备，“风高浪涌，扁舟盗窥”——“千古此忧患”，即“千古此坚贞”，没有生死如一、贞定不变的志操，不是中国人的风格和气派。这就叫作“贞一之理”。在“相乘之机”之中显现这个“贞一之理”，才能够成为火里的金凤凰。所谓“洪炉滴水试烹煎，穷措生涯有火传”，正是靠着这点精神而不朽的。

我注船山与船山注我是分不开的，因为我获得对船山理论框架的如此理解和解释，是极为艰难的，是积数十年的风风雨雨

雨，与自身“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庄子语）的反思，主体与客体相融合而得来的。

马克思说：“避免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个人是社会的存在物”。人于社会生存中不能不有所选择。要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以“走着瞧”的探索精神，从偶然到必然，从混沌到有序，排除障碍，达于坦途，就要充分发挥头脑中“多个自我”的多种方式的思维活动，主动决其取舍去就，其中就要有点不畏风霜刀剑，不畏兇虎豺狼，“孤行一意迥不与之相涉”，任何先验的模式都是一种前进的障碍。当然，典范的作用，仪型的作用是重要的，但那只是入门的向导，而千变万化之际，唯有靠自己，靠自己的主观选择。渡过千万重的险关峻岭，没有一种浩然之气，是不足以从“嗟哉沮洳场”的荒谬世界中，走向超越而“忽悟大光明”（文天祥语）的。没有这点真血气、真精神是不足以联系过去、现在、未来，不足以结合传统与现代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而观其会通的。正是由于如此，我注船山与船山注我是不可分的。船山的精神与我的精神也应该是可以观其会通的。

我在青年时，曾有过一个黄金时代，何以如启明星没有跃出地平线，正是受了僵化模式的羁绊。“臣罪当诛今天王圣明”，是马克思主义吗？当然不是，是封建主义，是奴性作怪。正是它貽误了我半生时间。晚年觉悟，而为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之计，从事于我注船山、船山注我的事业，历三十年。如果说：“走着瞧”代表着我青年时代，在实践中摸索前进的过程，那么，中年时代，我服膺于列宁一句话：“先要苦战一番，然后再见分晓。”它在艰难困苦中，召唤着青年时代生命的活力，激励着继续前进的勇气。及此老年，我依然未变初衷。罗贯中所说的那种“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人生观念和“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

付笑谈中”的生活方式，我难于效仿。我从“走着瞧”，“苦战一番”，而跨越到王船山的“有一日之生，尽一日之瘁。”从心态来说，也就是王船山所说的“人苟有志，生死以之，性亦自定，情则不能不因时耳。”

我发宏愿：以个人的有限的历史反思，把中华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编织在一起，化为充满希望的无限缤纷的彩虹。

船山说：

“事无功，而功功者存。道尼不行，而行行者远。”

文天祥说：

“乾坤未歇，地灵尚有人杰。”又说：

“江流如此，方来还有豪杰。”

没有这样的风格、操守、胸怀、气魄，何以对船山，而悟其“龙马谁之迹，星河尽此心”之妙趣，又何以作为中国人而笑傲于当今纷繁的世界呢？

1990年2月于昆明

目 录

王 序(残雪压枝犹有桔).....	(1)
自 序(我与王船山).....	(6)
引 言.....	(1)
绪 论.....	(4)
王船山的哲学意识体系.....	(26)
船山三论.....	(38)
一、物 论.....	(38)
二、心 论.....	(62)
三、史 论.....	(130)
我注船山, 船山注我.....	(165)
后录: 孔子·儒家·船山学.....	(179)
附录: 就《王船山学案》答青年朋友.....	(222)

引 言

一九八七年，《王船山学案》幸得问世。此书凝聚了我“迄今所有的全部生活经历”（黑格尔语）。在该书著述过程中，“灵魂与自己对话”（苏格拉底语），把自身的经历与船山学联结起来，由于我自幼嗜读船山《读通鉴论》、《宋论》，抗日战争期间，“国破家亡双泪暗，天荒地老一身轻”（杜甫诗句），奔走流离之中，船山的政治文章给予我不少力量。参加革命以来，尤其是历尽沧桑，饱经忧患之余，益觉在中外哲人中，能够启发人的心灵之觉醒，以投身于火热的革命斗争中，万死不辞，百折不悔者，舍船山莫属。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王船山的研究应该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改革、开放时代，不应死死抱定一个现成的、固定不变的“成型”（庄子语）限制自己的思想，我深感当代学者对王船山的研究，虽有很高的评价，但真正以全身心，以迄今所有的全部生活经历，去洞察和领悟其思想的精髓的实很缺乏，认识仍停留在他的最抽象，最普遍的概念上，而把他那从社会实践中切身体验到的情感丰富、意志自由、思想超越的思想精髓，抛在一边。列宁说要把经院习气一脚踢出去的话，实在也适用于对船山思想的研究。

对于船山思想的精髓，我以全部生活经历与相晤对，有较深的体会，在《王船山学案》的编著中，亦有所贯串，亦有所表达，但限于体例，对于我别有会心者，未能“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庄子语），把心灵中所领悟的东西都掏出

来。而我感到恰又正是这别有会心的东西才可称为绝学（“继往事之绝学”的绝学）。故有进一步撰写《王船山沉思录》之想。

我对《沉思录》之构思着重在于对船山精神境界以及他的主体性方面的见解作深层的探索。我不光从逻辑思维的途径去把握他。我赞赏现代英国历史学家伍德科林说的要在“自己的心灵中带着问题去阅读他们”（《历史的观念》），我也赞赏现代法国后结构主义者巴尔特，根据他的差异理论所提出的解构（或译拆构）阅读的方法，从《王船山学案》就已开始了对船山遗书的文本进行拆散，并对它的结构重新进行组合。《王船山沉思录》继作，更要从读者世界对船山文本作更为大胆的拆建，使船山学在现代化中发挥新的功能和作用。其实，这种方法，正是仲长统的“叛散五经，灭裂风雅”，陆九渊的“六经皆我注脚”，王船山的“六经责我开生面”，并非对船山文本的修改，而是释放出其文本中最具有潜能，最富于生机的微言大意，只有“六经注我”、“六经责我开生面”，才能继往世之绝学。不然就古人论古人，死硬的、僵化的教条，只能束缚人心，把活的变成死的，让死的拖住活的。当今，能够以王龙溪“悬崖撒手，解缆放舟”的气派从事学术研究的，尚属罕见，如何能够创立新的学风和学派呢？！所以，《王船山沉思录》之作，可以说又是一次新的尝试。

我之所以自幼嗜读王船山之书，似乎不可言说之中也有某种共鸣。王船山“小楼枕雨”诗的第一首是：

江城二月催寒雨，山客三更梦岭云。

青镜分明知鹤发，宝刀畴昔偃龙文。

援毫犹记趋南史，誓墓还谁起右军。

飞乌云边随去住，清猿无事忆离群。

我半生从事新闻事业，此非“援毫犹记趋南史”吗？那时